

## 我的百岁人生

○汪一鹤(1932 经济)

我原籍安徽绩溪。1908年出生在北京。生前,母夜梦大鸟红冠白羽,飞落庭前屋顶,我降生后,父亲就为我取名汪一鹤。

我父汪兆彭,法政学堂毕业,派到山西运城当法官。后调南京江宁地方法院。抗战胜利后改为首都地方法院,任院长。解放前,南京政府撤退,他就退休回北京养老了。

当初,我祖父十几岁时,只身外出,在瓷器店学徒,常随老板往返江西与华北各地,就在外省落户了。后来,他在天津自己开瓷器店,也曾一度兴隆,不幸一场火灾,烧得片瓦无存。家业就此中落。我们

移居北京时,为节省开支,借住在宣武门 外椿树头条 1 号绩溪会馆。我的童年就是 在会馆度过的。

那时,各省在京建会馆的很多,而县立会馆只有绩溪一家,可见绩溪人很重乡里之情。著名学者胡适来北京大学任教,会馆请他任馆长,他不但不推却,且对馆务很热心,常亲自来看望乡亲们。因此我常有幸面聆这位乡长的教益。对我学习成长影响最大的是他常说的两句话:一个人要好好地活;要动脑动手去找。好,是指身体好,道德好,学问好。找,是找知识,找道理,找振兴祖国的路。

于是我注意锻炼身体,参加体育活动。 我们的清华排球队,我打主攻,曾在华北 运动会上得冠。此后,体育运动一直是我



2012 年 8 月 24 日,上海市副市长赵雯(右 1)与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沈祖炜(左 1)向汪一鹤先生祝贺 105 岁寿辰。后立者为汪老女儿汪健

## □ 我与清华

的业余至爱。直到退休后,还常参与徒步旅行、登山等活动。这使我一生身体健康,很少生病。我今年实足一百岁,一般生活动作,基本上自理,散步能走一站路。

同时,我刻苦学习。我读师大附中、清华大学,都是很难考进的学校。1932年于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因成绩优异,学校留我免试读研究生。我的导师是陈岱孙先生。银行招聘,我被中国银行录取,分在天津分行。我把银行工作当做继续学习,很快熟悉了银行业务。两年后,交通部招考出国实习人员,条件是有高等学历并具财经业务经验。经考试,我与王紫霜、王维中、张企恭、陈家骏、董希锦共6人被录取。于1935年冬赴欧洲实习考察。

我们先在奥地利、德国实习邮汇、银行,然后到英、法、意大利等国考察调研银行、储汇及其他财贸设施。业余时间我到柏林大学选修外贸、财政课程。读满学分可参加博士考,但我们必须在1938年回国,只得功亏一篑了。

1938年末,我们回国,到上海邮汇总局工作。时值抗日战争,我们借鉴英国战时发行爱国储蓄的经验,建议政府发起抗日救国储蓄活动。由国家通过邮局发行"抗日爱国储蓄券",利用邮局覆盖面广的优势,既可大范围地聚集民间游资,支援抗战,又能广泛地培养人民节约储蓄的好习惯。建议被采纳并实施,这是我们为抗战做的一点贡献。

1941 年我自广西南宁调重庆总局任保险处处长。当时朱家骅初任国民党组织部部长,亟需用人。因当初派遣我等出国实习是他主交通部时办的,对我比较熟悉,就向邮汇局借调我去帮忙。于是我到组织

部兼任总务处长。1945年朱家骅离开组织部,推荐我给交通部俞飞鹏,我又由交通部借调,任主任秘书,直到抗战胜利。

胜利后我回到南京,辞去一切兼职,回邮汇局,任首席稽核,南京分局经理。

1947年,世界万国邮联大会在巴黎召开,我奉命代表中国邮政总局出席大会。这时中国人是以战胜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备受尊敬,被选为汇兑委员会副主席,令人感奋!

解放前夕,邮汇总局主要负责人撤退 广州,连番来信、来电并派人来催令留沪 人员携带局方在沪的资产,主要是黄金、 美钞及外汇,同去台湾。我与邮政总局谷 春帆,邮汇总局董希锦、王惟中等商议, 决定设法抵制。我们用各种托辞,巧与周 旋,拖延时日,终于迎来解放。把这笔财 产送到人民政府手里。

解放后,邮汇局停办。我被留用,任上海人民银行办公室主任。

1952 年我参加华东革大学习,结业后响应建设大西北的号召去新疆,分在塔城贸易公司。那里邻近西伯利亚,终年冰雪不断,生活很难适应。不久就四肢僵痛,关节失灵,但更难适应的是无事可做。那时新疆解放不久,旧势力十分顽固,加之当地的经济基础是农牧业,分在各基层单位闲置,每天就扫雪、聊天、看头头们打麻将。我几次请求调动,未获准,最后以重病辞职的方式,由省人事厅批准回上海,但言明是自动辞职,不是工作调动。

我回到上海,家庭团聚了,关节治好了,但失业了。

1955 年肃反运动扩大化,提篮桥监狱一时人满为患。不久,我也以反革命分

子罪判刑七年,走进了牢房。我想我一向 觉悟不高,未曾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但 我思想进步,热爱祖国,决不反对革命。 我在国民党组织部当过处长,在国民党政 府做过官,但那时国共合作,周恩来也当 国民政府主席,反革命分子这罪名迟早会 澄清。果然,1957年7月1日,新成区 人民法院重审此案,当堂宣布,对我的政 治历史问题"原判度刑确有不当","应 不予追究","无罪释放"。于是我安然 回家了。之后,静安区人民法院又郑重申 明,此案"属错案","应予纠正","彻 底平反"。并向我家属子女的工作单位 一一通告,消除影响。知错就改,而且工 作做得如此细致、周到,令人感动不已。

我获平反,政府即安排我工作,静安 区教育局派我到卫星中学报到(卫星中学 后来与爱国中学合并,再后又并入民立中 学)。于是,我做了人民教师,直至退休。

三中全会后, 老知识分子受关注, 上 海市社会科学院广聘专家学者。1978年 由蔡北华老推荐, 我受聘为社科院特约研 究员。当时国内经济发展很快,许多新问 题不断凸现。我深入研究,前后编写了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 两本书,对引进外资、利用外资问题,作 了详尽阐述。在当时, 算是这方面最早的 专著,一时各大专院校开设专业课,各省 市开放市场,都用来作为指导。于是,几 经再版,甚至脱销,社科院评为最佳著作 成果奖, 并因此给我 1982 年先进工作者 的荣誉。市委宣传部将此书列为 1979— 1982 哲学社会学科得奖著作之一。此外, 我还先后写了有关对外贸易、国际经济合 作、外向型经济、开发浦东等问题的论著, 刊登在各大学和科研单位的全国性刊物 上。如《经济研究参政资料》、《社会科 学》、《世界经济》、《上海经济研究》等。

1982—1990年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财贸委员会常邀请会外专家研讨关于涉外法规方面的问题,我经孙更舵主任推荐,多次参加这些研讨会。1983年国务院委托经贸部召开"全国利用外资会议",我以专家名义列席。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我应邀参加,对于《外资企业法(草案)》和《中外合作企业法(草案)》的制定,我提供了不少意见。其中很多被采用了。

我是民革成员,1984年我通过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向邮电部建议恢复开办邮政储蓄。建议被采纳,自1986年实施。至今全国邮政局所吸收民间储蓄超过200亿元。我受邮电部委托负责编写《我国邮政发展方向的研究》,共6万字,在部方的论证会上,获得好评。邮政储汇是我终身致力的专业。当我百岁之年得悉财政部批准成立邮政银行,喜讯传来,深感欣慰。

1988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聘我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我半生坎坷,虚掷光阴。晚年很想抓 紧时间,多做点有益的事。可是老骥心虽 壮,奈何力不从!年岁不饶人,不觉进入 耄耋之境了。

我进文史馆后,经济上享受适当的补助,精神生活丰富多彩起来。文史馆举办书画展、诗文会,还不时编辑出版具有珍贵文史资料的书籍,供馆员阅读。大大提高了我养老生活的质量。

我一生爱好体育,是为健身,从未有 过得金牌的奢望,可是2008年,我得了

## □ 我与清华

一块金牌:上海市静安区百岁老人金质寿章,是区老龄工作委员会颁赠的。这寿章由老凤祥用千足金特制,章面周围铸一圈百寿图小字,中间是四个大字:福瑞无疆;上方是我的大名汪一鹤及出生年月日,旁边立着一个满脸笑容、手捧大仙桃的小猴

孙(我属猴);还有一个显目的数字"52",这说明我是本区第52名百岁之人。这金章铸工精巧,图案既显典雅隆重,又觉温馨亲切,其中凝聚着多少党和国家对我的关爱!我手捧金牌,无比激动!

我的老年生活十分幸福。

## 我的清华岁月 我的清华恩师

○秦匡宗(1952化工)

1948年夏,我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同时考上了燕京大学新闻系和清华大学经济系。

我先到燕京报到,但是当年我的南模 好友、清华电机系的杨昌琪和化学系的王 政人等都劝我上清华。他们的主要理由是 清华有特别强大的教授阵容,以当年的文 法学院来说,陈岱孙、戴世光、费孝通、 潘光旦、张奚若、吴晗、冯友兰、金岳霖、 钱钟书、李广田等,都是我仰慕已久的大 师,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我就从燕京未

1 年 大

2002年,秦匡宗学长与夫人在母校留影

名湖畔的宿舍,搬到了清华的平斋。

第一学期,我的必修课"经济学概论"由陈岱孙先生讲授,"逻辑学"由金 岳霖先生讲授,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先生在 1948年夏不幸病故,当年的国文课由李 广田先生教授。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陈岱孙先生的"经济学概论"。陈先生的课,选修的同学特别多,有一百余人,而当年全校只有一千多个同学。上课是在同方部,这是当年清华最大的教室,仍是济济一堂,为了要占

前排的坐位,得在课间跑步去。那时,陈先生不过四十上下,西装革履,神采奕奕,课本是英文的,但他在课堂上则是中英文并用。讲课条理清晰,逻辑性强,有时还略带机智和幽默。1948年12月中旬的一天,我们正在同方部听陈先生讲课,讲到"marginal utility"(边际效用)这一章,忽然听到不远处传来隆隆的炮声,原来解放军已经逼近清华园了,但陈先生还